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历程

俞祖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100多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经过数代人不懈努力,我们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贯穿在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之中,几代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奋斗探索,走上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这条道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先驱们的不懈探索努力是不可分割的。回顾这段历程,总结其经验与启示,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选择

1921年7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种救国方案轮番上台,但都以失败告终”的背景上登上历史舞台的;党一经成立就成为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力量,推动了从早期现代化到寻求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真正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形成,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代化惨遭挫折后的势所必至,是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式现代化进行反思后的潮流所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种现代化方案择优比选后的历史选择。

受挫后的觉醒。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针对中华民族遭受的“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历史劫难,各种政治力量接连进行了反帝反封建斗争,仁人志士们从不同角度推动了器物、制度、文化层面的变革与现代化,提出“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方案,但这些努力最终都失败了,引领与推进现代中国发展方向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

反省后的转折。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期先进中国人的心目中,西方现代性一度是“提供美好未来希望的蓝本”,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1933年经济危机,使西方式现代化的严重弊端不断暴露,推动中国社会各阶层对其进行了深刻反省,整体取向从推崇西方文明转向了非资本主义前途。在1933年《申报月刊》关于中国现代化讨论的26篇文章中,多数选择了社会主义方式或非资本主义路径。我们顺应历史大势,在“一战”后的现代性反省思潮中推动实现从师法泰西到以俄为师转变,在经济危机引发现代化问题讨论后力主“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的新民主主义。

比较后的抉择。中国式现代化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在国民党政权主导的官僚资本主义现代化被历史无情淘汰的情况下,在英美派学人期盼的自由资本主义现代化“化成了梦”的背景下,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被历史证明“是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赞成的,舍此没有第二条路走”(《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9页),是推动中华民族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

信息与动态

“雨花英烈与伟大建党精神”学术研讨会举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用好活学丰富的党史资源”等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传承和弘扬雨花英烈事迹与精神,日前,由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南京中共党史学会、南京雨花英烈研究会、雨花台红色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的“雨花英烈与伟大建党精神”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20余人参加会议。雨花英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英雄的杰出代表,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忠诚践行者和生动体现者。

界民族之林的必经道路。

创造现代化发展的政治前提

1933年《申报月刊》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的主题之一为“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及促进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先决条件”。对此,我们党在创立时期就有了明确的答案。党的早期领导人已认识到,从根本上说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是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打乱中华民族复兴历程的两大障碍。1922年9月13日,《向导》周刊第1期刊发《本报宣言——〈向导〉发刊词》指出:“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李达在1923年4月发表《何谓帝国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分析中国的乱源,知道搅乱中国的两大障碍物,一个是国际帝国主义,一个是国内武人政治。”(《新时代》第1卷第1号)故而,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首先在“破”,即以反帝反封建斗争为实现现代化扫清道路。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实现”(《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1页)。在1947年12月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将“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视为“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必要基础(《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5页)。在1948年年底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为“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5页)。解放战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前提与根本方向得以确立。

孕育中国式现代化的过渡形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与探索离不开一个重要命题:“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个方式”,是采用资本主义还是采用社会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建党前后就有了明确的选择:必须以社会主义发展实业。李大钊在1921年3月的《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一文中指出:“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曙光》第2卷第2

号)。蔡和森在1922年5月发表的《中国劳动运动应采取的方针》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在中国,无论如何,是不能充分发达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应“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发展中国的大生产事业”(《先驱》第7号)。

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方案针对当时知识界所聚焦的工化还是农化、资本主义化还是社会主义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三项选择,作了符合世界现代化潮流、符合中国国情的深刻阐释。一是“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描绘了“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当时对现代化概念的理解,既包括狭义上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技术层面变革,也包括广义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整体变革”。

经济技术层面,工业化被视为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党的工业化思想最初是在“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论战中阐述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反对章士钊等人的“以农立国”论,力主推进国家工业化。瞿秋白在1923年7月的《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一文中批评章氏“不应当说现在中国还是农业国;更不应当说中国是农业国,就永世停滞”,指出“中国正在由宗法式的农业国,依历史的逻辑,渐进于商业工业国”(《前锋》第1期)。恽代英在1923年10月发表的《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一文中指出,“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申报》,1923年10月30日)。这充分表明党一经成立就自觉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毛泽东在大革命后期就主张“发展中国工业”(《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3页)、“促进中国工业化”(《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4页)。后来,他在《论联合政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献中都谈到了“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或“国家工业化”问题。除了关注工业化,后来的“四个现代化”的另一方面即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也已被纳入视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及“革新军制离不开现代化”,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号召“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奋斗”(《新华日报》先后设立了“自然科学”“科学专页”副刊,体现了对推进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度重视。

整体变革层面,提出了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中国”,造成“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奋斗目标(《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709页)。二是选择社会主义,设计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来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路线图。毛泽东在《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指出:“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上篇“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下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目前是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转变为

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45页)。

三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指导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论新阶段》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建立欧美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阶段“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除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5—679页)。

从某种意义上看,新民主主义现代化之路是中国现代化在“质变”即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前的量变积累、是成长为参天大树之前破土而出的茁壮幼苗。

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夯实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中国人民最终做出了三个正确的历史性选择,即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领导力量、根本遵循与制度基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三个历史性选择促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转换跃升,为中国式现代化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探索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具有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权”(《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430页),也具有了领导大规模现代化的地位,党的领导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是激发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具有显著优越性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使新中国具备了加快发展生产力的基础,具备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条件,社会主义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方向,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行稳致远。马克思主义是使中国人“由被动转入主动”的强大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遵循。正是“三个历史性选择”使近代由其他力量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使效仿“他者”的现代化发展而为走自己的路的现代化,使被动的、依附型的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而为主动的、自主型的中国式现代化,从而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新纪元。

(作者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中能够深切感受到,雨花英烈是中国革命艰难岁月里无数英雄人物的缩影,他们身上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顽强斗争、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等宝贵品质,体现着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继续弘扬雨花英烈革命精神,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精神动力。(赵凡)

党史

理论部主办 电话:67078942

特别关注·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

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场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深邃的洞察力与战略远见,准确把握战争发展趋势,超前谋划战略指导,领导做好全方位、可持续的战争准备,展示了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风范与宝贵精神。70年后的今天,重温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的战略意蕴,从中汲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胜利的战略艺术与精神力量,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战略远见

“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在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紧要关头,战略决策是一个极为重要、极为复杂、极为艰难的过程。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值此危急关头,敢不敢、能不能迎击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最强盛的帝国主义,对于成立不到一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正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出兵参战战略决策的通盘考虑。在美军远东司令麦克阿瑟断定中国不可能参战时,毛泽东从国际力量对比中洞悉局部突发事变,准确预测战争发展趋势,审时度势、前瞻筹划,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达到了战略上的最佳效果。

一方面,高瞻远瞩预判朝鲜战场形势。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坚决维护核心安全利益,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战略决策的基本出发点。1950年7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重点不是在出兵,而是在边防。8月上旬,朝鲜半岛南端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毛泽东警觉到美国很可能扩大战争规模,中央军委又组建东北边防军的二线、三线部队,加强边防兵建设,制定保卫大城市和工业基地的防空计划,开始向北方运送战士,力争必要时“出手即胜”。10月初,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面对美国出兵朝鲜、台湾和介入越南的“三把刀”威胁,中国若临阵退缩,势必进退失据,苏联也会减少援助;若出兵参战,不能打赢;若不出兵参战,不能打赢;若不出兵参战,不能打赢。毛泽东认为参战有三种可能:最好的可能是在朝鲜消灭美军,彻底解决朝鲜问题;中间的可能是战争出现僵局,我军最终停战谈判;最坏的可能是在朝鲜的现代化发展而为走自己的路的现代化,使被动的、依附型的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而为主动的、自主型的中国式现代化,从而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新纪元。

另一方面,全面分析战争双方优劣条件。出兵朝鲜的决策有很大的冒险性,同时又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说,“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我们是不打无把握之仗的”。从政治上看,美国侵略行径遍及五大洲,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而抗美援朝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举,获得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同情、支持和援助,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来源;从军事上看,美军存在“一长三短”、“一长”是钢铁师,“三短”是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首尾难以相顾;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战斗力不如美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美国实行的是全球战略,中国集中力量于朝鲜这一局部战场,“对于战争,我们是不怕的,因为我们有了20多年武装斗争经验的党和军队”,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的战略启示

王强 张晓燕

加之苏联的部分援助,就有可能取得局部战场上的胜利。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权衡利弊,认为美军“铁多气少”,“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这一战略决策,既是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和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相结合的产物,也是践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的典范。

“边打、边稳、边建”的战略方针

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方略。“边打、边稳、边建”这一抗美援朝战争的总方针,主要解决了抗美援朝作战和国内建设的关系问题,体现出我们党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把全局的能力,实现了打仗、建设两不误。“打”是首位,要“有策略地打”“稳当地打”“有目的地打”。“有策略地打”,是指志愿军到达朝鲜半岛之后,毛泽东多次电联总司令彭德怀,明确要“先打后建”,实行以运动战为主的方针,巧妙地运用战略、战役的突发性,坚决勇敢地给以连续打击。在第一次战役中,志愿军以一个军的力量钳制美、英军队,然后集中三个军逐一歼灭李承晚的三个师,有效削弱了美军在战场上的力量,粉碎了敌人妄图“在感恩节前后结束战争”的美梦。“稳当地打”,就是志愿军以自己的决心、行动放在稳当的基础上,不做办不到的事。毛泽东叮嘱:“我们每次作战不必抱有太大的野心,在每次战斗中,我军能够歼灭敌军一个营,至多两个营就够了。”“有目的地打”,主要是志愿军充分利用敌方十几个参战国之间的矛盾,采取了“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双管齐下”的战略决策,彰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非凡胆略、雄健气魄和深邃洞察力、卓越判断力。

“稳”是前提,要稳定国内政治和经济秩序。我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薄弱,一旦出现物价波动,财政、金融、贸易的运转就会紊乱,容易引起社会动荡不安,进而影响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了恢复经济、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运动、土改、镇压反革命、城市工作、整党建党、统一战线等七个方面工作,组织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国内稳定秩序和恢复经济全面铺开,开始形成前线与后方、战争与建设相配合相呼应的局面。“建”是根本,要搞好国民经济恢复以及国防力量建设。战争期间,我们党正确处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工业战线提出“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枪炮”的口号,农业战线加快完成新解放区土地制度改革,有效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到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810亿元,比上年增长73.8%。广泛深入地

开展抗美援朝运动,通过订立爱国公约、开展爱国生产竞赛运动、拥军优属活动等,各界人民捐献了可购买3700架飞机的巨款,有力支援了前线作战,为战争胜利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保障。至1951年春夏之交,中国入朝部队大部分更换了苏式武器,实现了制式的标准化,能及时保障弹药供应和零配件补充,军队过去“小米加步枪”的面貌变成整齐配套的各种枪械加大炮,为坚持长期作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略战术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语出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聂荣臻的一封信,关于作战方针的电报。这一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我军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精髓,力求扬长避短,夺取和掌握主动权。抗美援朝战争,是双方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不对称的一场战争。美军掌握制空权、制海权,采用了陆海空联合作战、空中绞杀战、空降作战、海上封锁支援战、细菌战等作战样式,某些战役战斗的炮火密度、飞机轰炸密度、战场兵力兵器密度和伤亡比例,甚至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针对美强我弱的军事态势,毛泽东强调,“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这一战略决策,既是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和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相结合的产物,也是践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的典范。

着眼作战任务,创新发展战略战术。第一次战役,志愿军在运动中歼灭冒进之敌,打赢了“遭遇与反击击战役”;第二次战役,志愿军采用的是迂回穿插和正面进攻相结合的运动战,极其成功;第三次战役,志愿军发动的是一场趁敌未稳的追击战,将敌从三八线击退至三七线附近地区;第四次战役,志愿军进行的是运动防御战,取得了横城反击战的重大胜利;第五次战役,志愿军采取的是攻击和防御相结合的运动战,总结出与现代程度较高的美军作战的一般规律;上甘岭战役,志愿军打出了令人胆寒的“上甘岭精神”;金城战役,志愿军实施了强有力的多兵种合同作战,把敌人“打得如落水般溃退”。志愿军统帅克拉克上将承认,志愿军掌握了“最新地面作战的技巧”,“联合国军”经常不得不在志愿军“选择的时间和地点”作战,“陷入敌人式的战争”。

围绕后勤保障,创新发展战略战术。为破解李奇微的“磁性战术”,粉碎敌人空中“绞杀战”阴谋,保证战场物资运输,志愿军多法综合施策、空地密切协同,以抢修、抢运、保通、空运、地面防空五位一体开展“后发先至”的后勤保障体系建设。其中,志愿军空军以师为单位,采取以少到多,以老带新,先打弱敌、再打强敌等办法,陆续投入作战。志愿军采取“分区设防、重点掩护”的方式,将70%的高炮兵力用于掩护铁路线,坚持重点掩护与机动抗击相结合。运输部队发明了“赶羊过路”“顶牛过江”等方法,装卸部队创造了“游击车站”和站外“分散甩车、多点装卸”的路子,用智慧建起了“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美军不得不承认:“尽管实施‘绞杀战’,共军地面部队的力量仍旧稳步地得到了补充。”70年后,与抗美援朝战争时相比,如今的现代战争形态已发生深刻变化。然而,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发展,战争形态如何演变,制胜机理如何演进,强军胜战的道理是相通的。我们要珍惜和运用好我们党在领导打赢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略智慧与历史经验,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深刻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推进强军伟业,掌握战略主动、赢得制胜先机。(作者系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特约研究员)